

王蒙 钩作品系列

文学江湖

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毛姆 钩 作品系列

文学江湖

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 王鼎钧著。—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3.1
(王鼎钧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4219-4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6425 号

本书由台北尔雅出版社出版繁体字本。我店取得作者正式授权，
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责任编辑 饶淑荣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岳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2.75

字 数 305 千字

印 数 00,001 – 20,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代自序 有关《文学江湖》的问答

敬答“九九读书会”诸位文友

你的第四卷回忆录一度打算名叫《文学红尘》，最后改成《文学江湖》，通常书名都有作者的寓意，《文学江湖》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文学也是红尘的一个样相，所以我记述所见所闻所思所为，取名《文学红尘》。后来知道这个书名早被好几位作家用过，就放弃了。

“红尘”是今日的观照，“江湖”是当日的情景，依我个人感受，文学在江湖之中。文学也是一个小江湖，缺少典雅高贵，没有名山象牙塔，处处“身不由己”，而且危机四伏，我每次读到杜甫的“水深江湖阔，无使蛟龙得”，至今犹有余悸。

你把自己的历史分割成四大段，每段一本，这个布局是“横断”的，可是每一时段的历史经验又记述始末，采取纵贯的写法，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结构？

这个结构是自然形成的，大时代三次割断我的生活史，每一时段内我都换了环境，换了想法，换了身份，甚或换了名字，一切重新开始。“大限”一到，一切又戛然而止。举个例子来说，我小时候交往的

朋友，到十八岁不再见面（抗战流亡），十八岁以后交的朋友，到二十一岁断了联系（内战流徙），二十一岁交的朋友，到五十二岁又大半缘尽了（移民出国），所以“我只有新朋友，没有老朋友”，这是我的不幸。

当然我也知道藕断丝连，但细若游丝，怎载得动许多因果流转，既然“四世为人”，我的回忆录分成四个段落，写起来也是节省篇幅的一个办法。

你把十八岁以前的家庭生活写了一本《昨天的云》，你把流亡学生的生活写了一本《怒目少年》，你把内战的遭遇写了一本《关山夺路》，你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青壮时期都在台湾度过，这段岁月经验丰富，阅历复杂，为什么也只写一本？材料怎样取舍？重心如何安排？

确实很费踌躇。我的素材一定得经放大和照明，我也只能再写一本，篇幅要和前三本相近，这两个前提似乎冲突，最后我决定只写文学生活，家庭、职业、交游、宗教信仰都忍痛割爱了吧，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文学江湖》。

敬答名作家姚嘉为女士

您的回忆录不但记录了您个人的步履，更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人的颠沛流离，家国之难，还不时回到现在的时空环境。书中许多细节，让人如临其境，请问这些资料是如何来的？（靠记忆？当年写的日记？买书？到图书馆收集资料？海外找这些资料困难吗？）

五十年代我在台湾，多次奉命写自传，由七岁写到“现在”，到过哪些地方，接触过哪些人，做什么事，读过哪些书报杂志，都要写明白。为什么要一写再写呢，他们要前后核对，如果你今年写的和五年前写的内容有差异，其中必有一次是说谎，那就要追查。因此我常常背诵自己的经历，比我祷告的次数还要多。

至于台湾的这一部分，本来想回去找资料，因健康问题久未成行。后来一看，也用不着了，我抗战八年一本书，内战四年一本书，台湾生活三十年也是一本书而已，材料哪里用得完？我自己记忆犹新，也有一点笔记，一点剪报，也可以在纽约就地查找，各大图书馆之外，还可以上网搜索。台北国家图书馆的“当代文学史料”网站尤其详尽可靠。

还有，我舍得买书，前后买了五六百本，看见书名就邮购，隔皮猜瓜，寻找跟我有关的人和事，了解当时的大背景，查对年月人名地名，有时一本书中只有三行五行对我有用，有些书白买了。

我写回忆录不是写我自己，我是借着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我的写法是以自己为圆心，延伸半径，画一圆周，人在江湖，时移势易，一个“圆”画完，接着再画一个，全部回忆录是用许多“圆”串成的。

写是苦还是乐？是享受吗？不写时是什么感觉？写不下去时，怎么办？

写作是“若苦能甘”，这四个字出于鹿桥的《人子》，我曾央人刻过一方图章。写作是提供别人享受，自己下厨，别人吃菜，“巧为拙者奴”。我做别的事情内心都有矛盾，像陶渊明“冰炭满怀抱”，只有写作时五行相生，五味调和，年轻时也屡次有机会向别的方向发展，都放弃了。我是付过“重价”的，现在如果不写，对天地君亲师都难交代。

咱们华人有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活到百岁，据说常在祈祷的时候问神：“你把我留在世界上，到底要我为您做什么？”我劫后余生，该死不死，如果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说留下我来写文章，写回忆录回馈社会。我写文章尽心、尽力、尽性、尽意，我追求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己之性。走尽天涯，洗尽铅华，拣尽寒枝，歌尽桃花。漏声有尽，我言有穷而意无尽。

说个比喻，我写作像电动刮胡刀的刀片，不必取下来磨，它一面工作一面自己保持锋利。当然，现在不行了，动脉硬化，头脑昏沉，有些文章“应该”写，可是写不出来，那也就算了。

敬答评论家蒋行之先生

写回忆录，要怎么样才不会折损回忆，或者尽量省着用？

NABOKOV 说他最珍惜的回忆轻易不敢写的，写到小说里就用掉了，以后想起来好像别人的事，再也不能附身，等于是死亡前先死一次。然而花总不可能一晚开足的，势必一次次回顾，特别是那么久远的回忆。如何在写作时保持回忆的新鲜？

用天主教的“告解”作比喻吧，说出来就解脱了。天主教徒向神父告解，我向读者大众告解。写回忆录是为了忘记，一面写一面好像有个自焚的过程。

用画油画作比喻吧，颜料一点一点涂上去，一面画一面修改，一幅画是否“新鲜”，这不是因素。

还有，怎么样才能正心诚意？我丝毫不怀疑先生的真诚，这正是先生作为大家的要素之一。然而人总是要作态，被自己感动了，希望自己能换个样子——写作时如何扬弃这些人之常情？面对年轻的自己而不宠溺，不见外，不吹毛求疵——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很想以当年的我表现当年，那样我写少年得有少年的视角，少年的情怀，少年的口吻，写青年中年亦同。我做不到，也许伟大的小说家可以做到。我只能以今日之我“诠释”昔日之我，这就有了“后设”的成分。

“历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要紧的是真有那个“小姑娘”。至于“打扮”，你总不能让她光着身子亮相，事实总要寓于语言文字之中，一落言诠，便和真谛有了距离。我们看小姑娘的打扮，可知她父母的修养、品位、识见还有“居心”，而生喜悦或厌恶，小姑娘总是无罪的。

当时的局面有太多棋步是您不知道的，重新拼凑的过程您也曾提及，但如何从拼凑历史的所得汲取养分而又不磨灭、干扰原先的认知？

您所说的“重新拼凑的过程”，就是我说的“一面画一面修改”。我在《关山夺路》中已显示许多“原先的认知”大受干扰。坦白地说，内战结束前夕，我的人格已经破碎，台湾三十年并未重建完成。

敬答纽约华文文学欣赏会会友

你跟同时代别人出版的回忆文学如何保持区隔？

有句老话：“不得不同，不敢苟同；不得不异，不敢立异。”我们好比共同住在一栋大楼里，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房间又可分为客厅和寝室，或同或异，大约如此。

恕我直言，今天谈台湾旧事，早有意见领袖定下口径，有人缺少亲身经验，或者有亲身经验而不能自己思考，就跟着说。我倒是立志在他们之外，我广泛参考他们的书，只取时间、地点、人物姓名，我必须能写他们没看到的、没想到的、没写出来的，如果其中有别人的说法，我一定使读者知道那些话另有来源。

说到这里趁机会补充一句：有些话我在台北说过写过，有些事我出国以后写过说过，这些材料早有人辗转使用，不加引号。我深深了解某些写作的人像干燥的海绵吸收水珠一样对待别人的警句、创意、秘辛，这些东西我当然可以使用它，本来就是我的。我已出版的散文集里也有几篇“回忆文学”，那些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

你在《关山夺路》新书发表会上说，你写回忆录一定实话实说，那时你用感慨的语气设问：“到了今天，为什么还要说谎呢，是为名？为利？为情？为义？还是因为自己不争气？”写远事、说实话易，写近事、说实话难，台湾生活环境复杂，忌讳很多，你是否把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了？

台湾的事确实难写，这得有点儿不计毁誉的精神才成。

我没有机会接触政治秘密，我写的那些事件，大都是和许多人一起的共同经历，只是有些事情别人遗忘了、忽略了，或是有意歪曲了，现在由我说出来，反倒像是一件新鲜事儿了，可能引起争议。

我说出来的话都是实话。叙事，我有客观上的诚实；议论，我有主观上的诚实。有一些话没说出来，那叫“剪裁”，并非说谎。《文学江湖》顾名思义，我只写出我的文学生活，凡是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我只能写出我认为有流传价值、对读者们有启发性的东西。

还有技术上的原因。一是超过预定的篇幅，实在容纳不下，还有我叙述一件事情，总要赋予某种形式。内容选择形式，形式也选择内容，倒也并非削足适履，而是碟子只有那么大，里面的菜又要摆出个样子来，有些东西只好拿掉，那些拿掉的东西也都对我个人很有意义，无奈我不能把文学作品弄成我个人的纪念册是不是？

可以说，我的回忆录并非画图，也非塑像，我的这本书好比浮雕，该露的能露的都露出来了。塑像最大的角度是三百六十度，任何人写的回忆录最多是一百八十度，我没有超过，也不应该超过。

最后我说个笑话助兴吧，有一对年老的夫妻，结婚六十年了，一向感情很好。有一天老两口谈心，老先生对老太太说，“有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你，现在咱们年纪都这么大了，没有关系了，可以谈谈了。”什么事呢，他问老太太：“你年轻的时候，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也有男孩子追过你吧？”老太太脸上飞起一朵红云，柔声细语：“我十六岁的时候，有个男孩写信给我，还到学校门口等我，要请我吃冰。”老先生一听，伸手就给老太太一个耳光，“好啊，到了今天你心里还记着他！”老太太掩面大哭，老先生站起身来怒气冲冲而去，儿媳妇孙媳妇围上来给老太太擦眼泪，连声问这是怎么了，老太太的回答是：“不能说啊！不能说啊！不能说的事到死都不能说啊！”

目 录

代自序

有关《文学江湖》的问答 1

十 年 灯

用笔杆急叩台湾之门	3
匪谍是怎样做成的	13
我从瞭望哨看见什么	20
投身广播 见证一页古早史	28
张道藩创办小说研究组	39
小说组的讲座们	51
胡适从我心头走过	62
广播文学先行一步	69
反共文学观潮记	82
特务的显性骚扰	92
我与《公论报》的一段因缘	103
难追难摹的张道藩	112
走进广播事业的鼎盛繁荣	122

十年乱花

我从胡适面前走过	135
魏景蒙 一半是名士 一半是斗士	141
方块文章 画地为牢	153
艺术洗礼 现代文学的潮流	163
霓虹灯下的读者	174
我能为文艺青年做什么	185
特务的隐性困扰	195
省籍情结 拆不完的篱笆	206
张道藩的生前身后是是非非	217
冷战时期的心理疲倦	229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亮光	240

十年一线天

你死我活办电视	253
乡土文学的旋涡	264
与特务共舞	272
我和军营的再生缘	284
我与学校的已了缘	292
我与文学的未了缘（上）	303
我与文学的未了缘（下）	312
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	321
王鼎钧台湾时期文学生活大事记	331

—
十
年
灯
—

用笔杆急叩台湾之门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纂的《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一“大事志”有这么一条：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上海抗拒“共匪”之国军部队，近已完成保卫任务，一部撤退来台。

这里记载的“一部”，其中有一个人是我，我这“一粟”由此倾入台湾这个大米仓。

这年我二十四岁。

我本来在上海军械总库当差，国共内战，争夺上海，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末日”之前，五月二十四日，我带着父亲寻路，夜间挤上一条船，只见甲板上坐满了军人，谁也不知道这条船开到哪里去，天空灰白色的云层很厚，不见日月星辰，所幸海上没下雨，风浪也很小。

日日夜夜，好不容易看见右方有水气饱满的绿色山丘，前面有颜色单调的陈旧仓库，船停在水中等待进港，有人摇着舢舨来卖大多数人都没见过的水果，说我们听不懂的话，使用我们没见过的钱。

这是台湾！这是基隆！原来这条船的目的地是台湾。依当时局势，它可能开往广州或者海南岛，这两个地方已是朝不保夕，所有撤出华东华南的人都渴求奔向台湾，台湾限制入境，多少有办法的人来不

了，我们竟无意中得之，似幻似真，如同梦境。

这才知道船上载满军火，台湾欢迎军火，我们是沾了光。这才发现“上校爷爷”住在舱里，他是军械总库的副总库长。这才发现我们兰陵王氏家族落难的子弟（总有二十几个人吧？）也挤在甲板上人堆里，论辈分，兄弟叔伯爷爷都有。他们从家乡辗转逃到上海，上校爷爷安排他们在军械库当兵吃粮，最后关头又通知他们上船。

这些族中子弟都是大地主之家的少爷，奉父母之命早婚，中共搞土改清除地主，大家纷纷逃亡，有人带着太太孩子。由一九四五逃到一九四九，离开上海是最后一步，他必须和眷属分手，这一去何年重逢？有人叮嘱妻子“你等我两年”，意思可能是两年以后我一定回来，也可能是两年以后你可以另外嫁人，妻子断然回答：“我等你二十年！”那时候认为二十年就是天长地久了，谁料这一去就是三十多年。

没有人通知或者暗示我可以上船，我能脱身是个奇迹。那时我受到的打击太多，感觉近乎麻木，对上校爷爷的差别对待没有什么反应。多年后回想当初，天津失守，我做了共军的俘虏，一个多月以后逃到上海，我还穿着解放军的破军服，给人多大想象的空间！在那种情况下，上校爷爷还安排我到分库去占一个上尉的缺额，那是多大的担当（上校爷爷万岁！），最后上海也得撤退，那时国军已经知道中共的间谍厉害，倘若我带着一颗自杀炸弹上船，与满船军火同归于尽，那还了得。上校爷爷作了他该作的考量。

好了，俱往矣！由沈阳经秦皇岛到上海，上校爷爷是我的福星，我感激他。回望大海，上海到基隆的路程四一九海里（七七六公里），台湾海峡的宽度一三〇公里，幸亏世上还有这个台湾！

基隆多雨，我们上岸那天是好日子，军方在码头上摆好一行办公桌，为这批官兵办理入境登记，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级职都写在十行纸上。我趁机会向他们讨了几张十行纸，他们一张一张地给，我一张一张地讨。登记后有人把队伍带走，惟有我们军械库的人仍然

留在码头上，据解释，这是因为船上军火还没交卸。

人群散尽，我回头一看，码头的另一端，竟然站着我的妹妹。

多少人读过《关山夺路》之后问我，“你和妹妹弟弟分散后又怎样团聚的？”他们听见基隆码头这一幕，无不啧啧称奇。妹妹和弟弟原在流亡中学读书，共军渡江东南溃败时，单一之、王逊卿两位老师带领他们奔到上海（单一之、王逊卿万岁！），防守上海的汤恩伯将军安排他们登上开往台湾的船（汤恩伯万岁！），他们比我早五天离开上海，船到基隆停留，准备开往澎湖。他们在基隆的那几天，妹妹天天到军用码头守候，盼望我和父亲也能撤到基隆。多年后，我回想那不可能的重逢，心情激动，可是我当时神经麻木，相对默然，只能旁听她和父亲絮絮对谈。

有一件事情必须做，我坐在水泥地上写稿子，希望在茫茫虚空中抓到一根生命线。基隆码头很清静，我随身有一支自来水钢笔，里面还有墨水，办理入境登记的时候，我向他们讨来的几张十行纸，正好派上用场。我完全不能写抒情文，喜怒哀乐心如刀绞，我必须把它当做病灶，密封死裹。我也不能写对台湾的第一印象，我看风景人物都模糊飘动，好像眼晕瞳花。我整天近乎眩晕，基隆那些日子每天上午晴朗，午后阵雨，怎么我看亚热带五月的阳光是灰色的，而且带着寒气。回想起来，我那时是个病人，可是我居然写出来到台湾以后第一篇稿子。我已忘记写了些什么，写完，随手化了个笔名，去找邮局，那时邮局有个小小的窗口，窗台下摆着一张桌子，一瓶浆糊。我用十行纸糊制信封，把稿子寄给台北《中央日报》副刊，发信地址写的是基隆码头，没钱买邮票，注明“万不得已，拜托欠资寄送”。我把信投进去，像个小偷一样逃出来。

过了几天，这篇文章登出来了，没想到这么快！我看见那片铅字，这才觉得自己确实由海里爬到岸上。好了，台湾“四季如春”，冻不死人，我能“煮字疗饥”，饿不死人，苟全性命，与人无争，气不死人。后来我打听谁是中央副刊的主编，有人告诉我他叫耿修业（耿修

业万岁！）。

一九五〇年八月参加暑期青年文艺研习会，耿先生来演讲，我们问他怎样选稿，他说处理来稿有两大原则，“快登或者快退”。他说每天大约收到一百篇文章，由三个人审阅，当天晚上选出优先采用的文章立刻发排，第三天就可以见报，再选出几篇长长短短的文章列为备用，以备适应版面的需要。第二天又会收到大约一百篇文章，头一天剩下的稿子已经没有机会，助理人员马上退回，作者早日收到退稿可以早日另作安排。

后来知道，协助耿主编看稿的两个人是孙如陵和李荆荪，他们三位新闻从业的资历很深，学问和道德修业很高，这样三位高水准的人经营副刊，那年代再无第二家报纸可以做到。后来我做了新闻界的新兵，跟他们又结了许多因缘。

为了投稿，我得想一想我对台湾了解多少。历史老师讲甲午战争讲得很详细，国文老师教“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嘴里痛在心”，教得很认真，这些材料人人知道，副刊主编大概没兴趣。

山东乡贤王培荀在他的《乡园忆旧录》里说，台湾玉山的山顶上全是白玉，那些玉是裸露的，并不藏在石头里，山中有恶溪、毒兽、生番，人不能近，没法开采。这又说得太离谱了，主编会朝字纸篓里丢。

《随园诗话》引咏台湾诗：“少寒多暖不霜天，木叶长青花久妍。真个四时皆是夏，荷花度腊菊迎年。”诗虽然平常，人家说台湾四季如春，他说台湾四季皆夏，有点新鲜，可以入眼。

中国大陆有一首民谣：“台湾的水，向西流，花不香，鸟不鸣，男无义，女无情。”惹得多少台湾人怒容满面，“外省人歧视台湾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但是我说，这首民谣并未在民间流行，它是李鸿章写在奏折里安慰慈禧太后的。甲午战败，割让台湾，李鸿章很难过，慈禧心里的滋味又岂能好受？所以李鸿章故意贬低台湾的价值，君王专制时代臣子如此进言，乃是尽忠，大家也谅解他言不由衷。我装做很博学的样子提出假设，这首民谣恐怕是李鸿章的幕僚捏造出来